

应用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后现代转向

裴如意

(盐城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应用语言学研究经过行为主义语言学、交际功能语言学、多学科语言学、二语习得、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的继承和发展,正日益显示出“阐释性”和“批判性”的特质,对语言教学理论、语言大纲设定、语言教育政策、语言教育实验等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其突出特征是人种志研究方法和批评参与方法的兴起。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研究范式;后现代

中图分类号:H0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4-0052-05

20世纪70年代前后源自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和英美科学主义思潮的后现代主义,成为当今社会影响各个文化领域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后现代主义强调对正统的否定、消解和反思,科学知识不再是确定的、恒定的和普遍接受的,它是一种“话语”或“语言游戏”。Lyotard认为语言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后现代文化知识的异质标准^[1]。在后现代主义中,一切知识都是多元的、可变的,这与强调统一性和整体性的统治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应用语言学经过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到交际功能语言学研究范式,到多学科语言学研究范式,到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再到建构主义研究范式的继承和发展;经过科学主义、一元研究视角到崇尚解释、多元研究视角融合的过渡,已经逐步走向后现代主义。

一、应用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

行为主义的语言学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个范式,其贡献在于为语言问题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法,这一研究传统至今仍在对应用语言学施加影响。所谓“科学”原则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认为语言教学应该沿着固定不变的路线进行的理念。然而从教授简单的语法开始,逐步过渡到教授复杂语法的教学法,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证研究支撑^[2]。同样那种认为学生必须认同目标语文化才能习得二语的观念,尽管在二语习

得和融合动机理论对于社会文化解释中反复出现,已经被证明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如Coetzee-van Rooy的调查发现讲索托语的非洲巴索托人和讲南非荷兰语的南非人在学习英语时,其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积极认同与优秀的英语水平呈正相关^[3]。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第二个范式是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在这一传统下,研究者坚持认为和社会密切相关的、更大的语言单元对于语言的教和学至关重要,他们在区分文本、话语和语域方面找到新的研究兴趣点^[4]。这一传统的贡献在于拓宽了语言学习的内容。其研究兴趣之一是探讨话语在学习者对目标语文本的使用中如何实现连贯或衔接。这些研究还包括描述学习者话语、目的语及需被学习者理解的话语。为此,有研究者对语言的功能进行了分类,以服务于语言教学交际法^[5]。

应用语言学的多学科研究范式极大地拓展了学科基础。研究者认为不仅源自语言学的理论对语言的教与学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教育学及和学习理论相关的心理学也对语言教学的开展提供更加深入的阐释。由此,研究语言教学的应用语言学就完全摆脱了语言理论成果的束缚。这一研究传统对当前后现代转向的应用语言学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拓宽了应用语言学基础,而在于它为多学科研究范式的兴起做了铺垫。尽

收稿日期:2013-09-04

作者简介:裴如意(1975-),男,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管它没有产生自己的研究日程,但是它为技术上更复杂、更先进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对语言教育涉及的各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些实证研究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下一代传统的标志,也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例证。

二语习得研究的范式表明对于语言调查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水平。研究者最初的兴趣在于确定某些词法和句法结构的习得顺序^[6]。既然学习者的母语构词形态的发展已被证明是有序可循的,研究者完全可以假设二语的学习也应该有相似的顺序。这种分析的出发点是有一个不变的语言习得顺序有待发现,研究者进一步假设这种顺序是固定的,语言学习的认知能力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自然,这种假设不仅社会学习理论和交际学习理论的支持者反对,也受到来自其他观点的挑战。这样,二语习得研究者的兴趣很快转向对话语而不是思维的结构怎样影响二语习得的研究^[7]。他们认为语言的习得依赖于交际互动。研究证实即使在单个单词阶段,交际互动和话语的结构也为单词的自然习得提供了可能。例如,Hatch发现母语和二语学习者中都存在相似的、不变的语素习得顺序,并从交际角度作了有趣的社会学解释^[8]。

应用语言学中的后一个传统通常研究前一个传统提出的话题。二语习得最早的研究是在对比分析的框架中完成的。对比分析后来又被错误分析所取代。正如Schachter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错误分析掩盖了学习者会因为学习和掌握某些结构感到困难而有意回避的事实,所举的事例是中国和日本的语言学习者因为感到关系从句较难而避免使用^[9]。这样错误分析又让位于许多其他的研究视角,包括中介语研究、行为分析以及社会语言学分析的方法等。

同样地,二语习得研究也继承前一传统的研究日程,通过对语篇能力的互动解释预示着建构主义诞生。作为第五个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历史范式,建构主义有着数十年的辉煌。这一研究范式在南非的“起点项目”(Threshold Project)中得到很好的验证。“起点项目”考察语言教学在黑人学校面临的挑战。研究的重点是揭示学习是如何通过语言媒介进行社会建构的,借此探讨学习者所掌握的认知策略及教师在培养学生学习策略上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个范式和传授式教学是完全相对的。传授式教学认为知识(语言、科

学、数学等)来自权威(如教师、教材),是能够传授给学习者的^[10]。这一范式的意义还在于它为语言教学交际法以及众多的语言交际任务等经常采用的让学习者通过和他人的互动来建构语言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后现代转向

应用语言学的每次范式转变都从前面的范式得到启发并试图回答前面范式的一些研究问题,每次范式转变都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及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例如:多学科研究的范式为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后现代视角铺平了道路。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使得研究者不再将单一观点,尤其是实证主义的研究视为唯一正确的、科学的和客观的方法,转而承认在语言教学问题中存在多视角、多层次的可能性。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面临的挑战在于对研究中出现的争议和共识进行甄别。

进一步的挑战还在于辨别语言教育的政治问题。如:严格规定的语言教学大纲对于没有置喙权的教学者和学习者有哪些影响?援引哪个权威才能使得在全国范围引用新的语言教学方法具有合法性?如果成人学习者不能制订自己的学习目标和描述自己的学习目的,语言教学对他们究竟有多大帮助?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统治地位对于其他语言的教学,尤其是没有政治权力的语言教学起怎样的支配作用?语言教育的上层设计面临怎样的挑战?

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对于语言教学理论虽不至言听计从,但是却深受影响。每一个语言教学者的成长固然有其理性反思和亲身实践,但无一例外都接受过各种语言教学理论与流派影响,而后现代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研究者会关注学术研究者对于教师能力范围内的干预究竟有哪些权力。这一问题在应用语言学的早期就曾备受关注,Chomsky总结了早期研究者的疑问认为,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有责任对这些理论和建议的价值作出评价,而不应基于现实或假定的权威被动地接受^[11]。

这些关注构成了对应用语言的研究进行重新设计,从业者(如教师)获得了控制以及影响研究的力量。在应用语言学中,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动力来自于对始自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研究目标的反动。而启蒙主义受科学构想是渐进的提高(作为

分析项目的结果)这一理想的驱使,导致了应用语言学学科的产生。Brumfit把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主体性和相对主义联系起来,总结认为由于这些思潮的影响可能出现的极端相对主义立场。因此,他认为我们从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中应该学习的是有效的批评而不是彻底的“怎么都行”的理论虚无主义^[12]。

1. 人种志方法的兴起

正是对于多元研究视角的强调才使得语言实践的人种志(ethnographic)研究成为后现代主义方法中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人种志研究的核心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交互作用”的实地调查研究。因此,即便是对人种志分析方法的粗略审视也可以解释这种分析对于语境的重视。Nunan认为语境对行为研究有巨大的影响,在人种志描述中至关重要^[13]。人种志的方法首先提倡实地研究——在原地点,不操控事件及相关的变量。这些研究通常包括进行详实的实地研究笔记,把记录的信息和其他记录,如课程的录音或重要时刻的课堂互动内容的转写等进行协调对比。此外,研究并不仅仅由单个熟练的专家独自开展,而是通过协调其他参与者进行一致的行动。如对语言学习者和教学者的想法通过座谈法、日记法和学习日志法进行记录。通过这种“深度”的描述,人种志研究法试图建构尽可能丰富的语言学习产生语境的图像来进行研究,得出有助于解释语言学习的结论。

人种志研究的最本质的定义特征在于其所提供的充分解释。不仅参与其中的研究者、教学者和学习者可以检查这种作为研究目的的解释的适当性,而且同时期的研究者也可以进行验证,亦或与类似语境中的发现进行对比。应用语言学研究采用人种志研究方法是因为其消解了实验研究割裂与外在因素的联系以及抽象的特征,从而达到其他研究方法无法企及的理解深度^[13]。正如Nunan提到的那样,“……现阶段我们在工作中并不是寻找平均数、标准或可归纳性,而且我们对于总数和样本不感兴趣。事实上,我们很乐意通过具体的、非典型的和独特的研究而有所发现^[14]。”Gebhard也肯定了这样的人种志研究方法^[15]。

然而,作为适合于对社会群体、个体与群体所处的背景以及人际交往过程研究的方法,人种志研究需要研究者在现场进行长期的观察、访问、记

录,并且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结果的有效和可靠。此外,要成为一个合格熟练的人种志研究者同样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方法的确可以和量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为语言教学提供多视角的理解。

2. 批评和参与的方法

提供多视角、多层次的解释仅仅体现了后现代应用语言学的主题。当前,许多研究者认为人种志研究描述的解释还不够深入。比人种志描述的调查方法更为深入的是批评和参与的方法。例如:对课堂参与者(教师与学生)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的关注;或者寻求揭示语言教学决策者(大纲制定者和设计者)与执行者之间的不平等的关系。批评和参与的方法给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的方法在“形成新的政治化的模式^[16]”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方法。通过批判,应用语言学走向了最初的语言学——行为主义的研究传统的对面,从而使得应用语言学的构建传统变得不再连续的了。

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批评方法不仅关注和研究语言学习环境中存在的不平等,而且寻求改变和转化这种环境。例如,研究者对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关注,对英语教学给其他语言学习(尤其是当地语言)的影响有怎样的反思?性别如何影响读写教育,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怎样尊重少数民族裔的语言以及如何消除不尊重?阶级特权或种族分歧如何通过语言教学而具体实现以及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

批评方法使用各种研究形式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这一研究问题的方向“并不构成具体的路径或研究方法,而是关注何种研究可以对更为宽广范围的道德与政治问题做出回答”^[17]。批评的方法避免了实证主义对于数量的强调和预测的调查过程效能的信仰。正是关于这一点,Rampton指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和政治可能性……正从应用语言学研究发展中发展起来”。批评教育学舍弃了那种对知识公正无偏的观念的信仰以及认为科学是中立的,不受政治利益影响的主张。科学知识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产物^[18]。

批评教育学始终对应用语言学传统概念中形成的固有的进步主义观念保持警惕。在传统的西方学界,进步是科学应有之意;而批评教育学则否定这种认知。例如 Pennycook 对于应用“科学”

原则进行语言教学取得了进步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坚持认为当前的语言教学只是对同样的基本选项的不同配置,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稳定的、直线式进步的结果^[16]。在这种观点看来,语言教学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的、政治的或哲学的影响。因此,批评应用语言学的任务首先在于揭露进步主义关于科学的“神话”,关于科学分析或研究如何必然提高语言教学的“神话”;其次,提供可以揭示语言教学中转变与变化的真实原因(即社会政治的)的分析。

批评方法在应用语言学研究走向成熟的另一标志是拓宽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范围。Gebhard 通过充分论证认为,二语教学的课堂语境并不独立于制度结构之外,也不保持政治的中立。她支持课堂二语习得的语境理论,认为在话语权利分配中,制度机构与学术成就及学业成败的结合发挥作用。在她所引用的研究事例中,可以清楚看出学校的组织结构潜意识中往往将学生分为“语言水平有限的”或者“不能胜任语言学习的”类型。这种分类只是对问题的定义起了强化作用,对于问题的解决却没有帮助。同时,因为对学习者的低期望值以及通过教材等材料提供的低层次的支持也使得问题变得更糟^[15]。Street 对于学术读写能力和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写作能力表达过本质上一致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不要把写作问题解释为单一的技能缺失,而要重新集中探讨制度化语境而非个体语境^[19]。

批评应用语言学关注语言的社会语境,认为语言研究应该基于语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而不应割裂两者联系。在语言教学研究中,批评应用语言学更加关注个体以及弱势群体的语言权利,抵制英语在外语教育中的霸权地位,这为应用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丰富了传统应用语言学理论。从语言教学的实践来看,批评方法的使用主要是外语阅读教学中的批评语篇分析教学法、对语言教学的批评以及对语言测试的批评。批评语篇分析教学法是批评语篇分析的理论在语言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批评语言教学则是对语言学习者进行需求分析,进而设计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特征学习者要求的大纲以及课程;批评语言测试探讨语言测试与文化、社会和政治语境的关系。

国内随着大学英语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者正逐步反思和探讨大学英语教学以及测试给学习者个体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如学生因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不同分数而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利”等,而这又将进一步推动大学英语改革。

三、应用语言学的新趋势

后现代研究范式的应用语言学研究至少有两条发展主线。一种是解释性的,人种志方法的方向;另一种是批评性的政治反思方向。新的研究范式使得曾经湮没的研究主题得以再现,Rampton 在描述这种“再现”(resurgence)时,肯定了应用语言学的后现代研究范式转向与前面研究范式的连续性。他详细地指出 Widdowson 后来的观点与批评方法之间的差异,他的分析指出在关键方面后者也可以看成对应用语言学第二次研究范式转变的响应^[18]。Widdowson 对此做了突出的描述,例如:应用语言学研究基础的拓展在 Hymes 的交际能力的观点中(与此对比的是乔姆斯基狭隘的语言能力观)得以体现^[4]。Rampton 还证实了 Hymes 不但设想了可以超越现存理论的语言学,而且设想了可以帮助克服语言中的不平等的“社会建构”语言学,以关注社会结构。

后现代主义转向的应用语言学是一种社会解释学观点^[19],它将借助批评的力量,运用人种志的方法探讨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政治、语言教学与社会、语言教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从而不断增加和提高“解释力”——这也是它的确定方向与特征。应用语言学研究并不能实现早期科学主义所激发的热情的诺言,为语言教学提供解决方案;虽然这种需求一直都是极为迫切的。当前的研究者毫无疑问会批评第一代的语言研究工作(或许包括第四代、第五代),指责其结构主义的、内在的自大——认为研究者只需将语言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就可以找到方法,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总之,后现代应用语言学不是完全取消理论,放弃标准;它是一种积极的批评,是对各种语言教学的方法和理论保持开放的态度,从而实现应用语言学更大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 Lyotard J 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8.
- [2] Lightbown P M. Great expectation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and classroom teaching[J]. Applied Linguistics, 1985, 6(2): 173 - 189.
- [3] Coetzee - van Rooy S. Cultural identity profiles of Afrikaans and Southern Sotho speakers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 resource or hazard[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ALSS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2000.
- [4] Widdowson H G. Direc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discourse. In Brumfit, C. J. & Johnson, K. (ed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49 - 60.
- [5] Wilkins D A. Notional syllabuses: a taxonomy and its relevance to foreign language curriculum developmen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6] Truscott J. Review article: The case against grammar correction in L2 writing classes[J]. Language Learning, 1996, 46(2): 327 - 369.
- [7] Cook V J.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an interactionist viewpoint[J]. Interlanguage Studies Bulletin, 1981, 6(1): 93 - 111.
- [8] Hatch E. An historical overview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In Henning, C. A. (ed.) Proceedings of the Los Angeles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Forum[C]. Mimeo, 1977: 1 - 14.
- [9] Schachter J. An error in error analysis[J]. Language Learning, 1974, 24(2): 205 - 214.
- [10] Macdonald C. Teaching primary science in a second language: two teaching styles and their cognitive concomitants. In Weideman, A. J. (ed.) Styles of teaching and styles of learning.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outhern African Appli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conference[C]. Bloemfontein: University of the Orange Free State, 1988: 115 - 127.
- [11] Chomsky N. Linguistic theory[C]. In Smolinski, F. (ed.) 1985. Landmarks of American language & linguistics. A resource collection for the overseas teacher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Washington, D. C. :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66: 263.
- [12] Brumfit C. Theoretical practice: applied linguistics as pure and practical science. In Mauranen, A. & Sajavaara, K. (eds.) Applied linguistics across disciplines[C]. AILA Review, 12 1995/6. Milton Keynes: AILA, 1997: 18 - 30.
- [13] Nunan D. Research methods in language lear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53, 69.
- [14] Nunan D. Seven hypotheses about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J]. TESOL Matters, 2000, 10(2): 6.
- [15] Gebhard, M. Debates in SLA studies: redefining classroom SLA as an institutional phenomenon[J]. TESOL Quarterly, 1999, 33(3): 544 - 556.
- [16] Pennycook A. Introduction: Critical approaches to TESOL[J]. TESOL Quarterly (Special topic issue: Critical approaches in TESOL), 1999, 33(3): 329 - 348.
- [17] Pennycook A. Critical pedagogical approaches to research. In Cumming, A. (ed.) Alternatives in TESOL research: descriptive, interpretive, and ideological orientations[J]. TESOL Quarterly, 1994, 28(4): 690 - 693.
- [18] Rampton B. Politics and change in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 16(2): 233 - 256.
- [19] Street B V. Academic literacies and the 'New communicative orde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student writing in HE [R]. Keynote address at the CALSS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2000.

Postmodern Turn of the Research Pattern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EI Ru-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Applied linguistic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eatured by such traits as "interpretability" and "criticalness" after its evolution in the research patterns from behaviouristic linguistic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multi-disciplinary linguistics, 2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structivism to Postmodernism, which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language teaching theories, language syllabus formatio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language experiments, etc. Among the postmodern research patterns, ethnographic and participatory methodology are highlighted.

Keywords: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patterns; postmodern

(责任编辑:李 军)